

共和国

纪实

共和国心脏地带揭秘



党史出版社



第

五

卷



在厦门海域，海军只部署了少量岸炮和快艇，从未进驻过鱼雷快艇部队。现在，怎样把一大队 12 条鱼雷艇从上海锚地鬼神莫测地弄到厦门去，这是送走了彭德清之后，陶勇开始劳心费神的头等大事。

有两条路线可选。

一条是海路，自己开过去。海路航程约 700 海里，温州以北无大碍，白天亦可航行，洞头岛以南便进入马祖、金门等敌占岛封锁线了，白天难以顺利通过，即便夜晚，要想躲开敌人各种手段的观测也有困难。

一条是陆路，用火车运过去。火车速度快、保密系数高，无疑比海路优越。但每条鱼雷艇长约 20 米，而火车平板车每节才十几米，鹰厦铁路又依山傍水，道路弯曲，隧道有 100 多座，鱼雷艇能不能装上火车，装上了能不能运过去，运过去了能不能卸载下水都是问题。

南京军区军运处、东海舰队军运处和上海铁路局集中群众智慧，提出了以 3 节火车平板车运载 2 艘鱼雷艇的方案。为了解决转弯不受影响，有人又提出可以将两艇首相对，使艇首伸到中间一节平板车上，而艇的重心则落于前后两节平板车，当火车运行转弯时，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自由调节。上海有了办法，厦门积极呼应，彭德清在和平码头，几天内抢建出 250 米长双轨铁路，使鹰厦铁路终端可直达岸边，并调来 50 吨吊车一部，以确保 22.5 吨重的鱼雷艇平稳入水。

鱼雷艇车运南下难题终获解决。上海张华浜车站岗哨林立严密警戒，陶勇亲临现场，指挥鱼雷艇装车和伪装。是夜，张华浜内无“海军”，鱼雷艇一大队官兵全部着黄绿色陆军服。这也是陶勇的主意，并亲自打电话向上海警备区借来一批陆军服装，为的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扰乱敌特视听。鱼雷艇们也穿上了“衣服”，掩盖上大篷布，一列车鱼雷艇变成了一列车大米、苹果或你猜什么都成的普通货物。

运载快艇的专列是铁道部从锦州机务段专门调拨的。这辆机车是抗美援朝的功臣车，机车组 14 名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专列经过的每一车站，都是站长亲自值班，不管在哪个站停，专列都夹在中间，两边有货车挡着，车站把饭菜送上车。沿途所有桥梁、涵

洞都有民兵站岗。

8月1日凌晨，专列到达厦门，开进山洞，在山洞里呆了一个白天，夜间开到码头卸载。卸载用的铁路吊车，是陶勇亲自打电话请求铁道部门调运的当时全国唯一一台50吨铁路吊车。整个车运行动周密细致，万无一失。

在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下，12艘鱼雷艇被陶勇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搬到了厦门前线。

8月22日夜，6艘鱼雷艇离开虎屿，沿海岸线采取最低速度航渡，一进入敌雷达工作范围，就编成并列方阵形的密集梯队，一艘紧挨一艘。

这样，在敌方雷达荧光屏上，6艘鱼雷艇组成的反光信号和1艘75吨护卫艇的反光信号差不多。因为，鱼雷艇是铝合金壳，回波信号弱；护卫艇是铁壳，回波信号强。雷达显示的6艘鱼雷艇就成了1艘护卫艇，达到了隐蔽的目的。

快艇进驻待机点镇海角定台湾的前一天，厦门港航运公司的12艘大型机帆船就到定台湾分散抛锚，2艘帆船夹1艘快艇，并预留下鱼雷艇锚的位置。快艇在天亮前进驻定台湾，分别靠上机帆船，放倒雷达天线，用防空网遮住艇体。帆船升起风帆，挂满渔网，把紧靠在内侧的小快艇遮掩得严严实实。

上午，海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彭德清司令员到定台湾看望快艇部队，大队参谋长张逸民从指挥艇下来，乘舢舨到陆地迎接。彭德清说：“我看了半天，以为你们没到。”

为防止暴露目标，隐蔽期间部队规定：白天人员不得在外面走动；夜间严格灯火管制；不准往海面抛物品；不准煮饭冒烟；不准发出大的响声。

当地政府组织也很严密。机帆船上设有党支部，快艇部队的食宿均由帆船负责；厦门航运公司的领导，亲自在现场督战，民兵对通往港湾的陆路和水路，实行严密封锁。

快艇进驻定台湾的当天，国民党空军飞机两次从上空飞过都没有发现鱼雷艇。国民党海军向台湾当局及美军顾问团保证；金门前线共军没

有海上进攻型武器。一直到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始终没有发现鱼雷艇到福建前线。我军侦察部门截获金门防卫部向台湾报告：“我前沿阵地加强日夜观察，没有发现共军有任何调动兵力的迹象，那种共军要袭击我军的说法，纯属谣传，不要轻信，把自己搞得神经过分紧张。”

战前出色的隐蔽措施以及国民党军的毫无防备，为人民海军首战突袭成功创造了条件。

8月23日下午，炮击金门开始，惊天动地的炮声震撼大地。隐蔽在定台湾内的快艇部队看不见密集的炮弹带着曳光飞掠海空的壮观场面，但听得见隆隆的炮声似雷声滚滚，经久不息，战斗情绪高昂。指挥所赋予快艇部队的作战任务是夜间出击攻击敌舰。当夜没有情况。

8月24日2时05分，指挥所通报敌情：国民党海军4艘军舰组成的运输船队从马公来金门，其中“中”字号1艘（“中海”号坦克登陆舰）。运输船队大约16时左右抵料罗湾。16时30分，“中海”号等4艘舰船抵达金门海面。

17时15分前指首长决定：岸炮先打新来“中”字号，当敌逃窜时，快艇则坚决把它消灭。

18时07分又强调：快艇大队在“中”字号出料罗湾后要包下来。此时，指挥所赋予快艇大队的任务很明确，要击沉刚从台湾来的“中海”号，要击沉进出料罗湾的“中”字号坦克登陆舰！

这时，金门海域有2艘“中”字号，一艘是“中”字号改装的“台生”号运输船，一艘就是“中海”号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量均为4080吨，装备有8门40炮和14门20炮（“台生”号火炮已拆除）。是当时国民党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船。8月23日炮击开始时，“台生”轮正在金门料罗湾双打街卸货，连中5发炮弹，甲板冒烟起火，但损伤不大。舰长紧急倒车驶离岸滩，在料罗湾东南岸炮射程之外的海面抛锚观望。

24日17时18分，金门国民党军炮群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抢先开炮，集中轰击莲河、围头解放军炮兵阵地，发弹3500余发，凶狠而猛烈。目的很明确：掩护料罗湾内的卸载。

乘此机会，“中海”和“台生”号迅速抢滩卸载。“台生”号装载



的主要是弹药，卸载较慢；“中海”号运送的主要是人员，输送较快。这样，前线指挥部计划阻止“中海”号进入料罗湾，在海上用岸炮和快艇将其击沉的方案未能实现。

17时30分，带伤的“台生”号和“中海”号开始外逃。彭德清当即命令镇海指挥所，出动6艘鱼雷艇，将敌舰击沉。

鱼雷艇编队指挥员是张逸民。他在1955年1月10日单艇独雷击沉敌舰“洞庭”号以后提升为大队参谋长。张逸民正要组织出击，彭德清又亲自打来电话。

“我向军区叶政委、舰队陶司令打了保票，一定要击沉1艘大型登陆舰的。”彭德清交代了任务，又问：“你有把握吗？”

“请首长放心，”张逸民信心百倍地说：“有把握击沉1艘，争取2艘都击沉！”

彭德清提醒他：“你要先集中兵力干掉1条，有把握时，再打另一条，你们是代表海军参战的，一定要为海军争光！”彭德清与陶勇共处多年，陶勇的风格影响着他，他像陶勇一样地叮咛着部下：“你们干掉1条，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干掉两条，就算超额完成任务，回来就给你们记功！”

18时10分，鱼雷艇闪电般出击，并顺利通过敌人的炮火阻拦。近17时，指挥艇雷达发现敌舰艇群正向我艇队方向移动。鱼雷艇指挥员决定以一中队、二中队分别向“台生”轮、“中海”号登陆舰攻击，并放烟幕伪装，迷惑敌人。17时25分，我鱼雷艇二中队占领有利阵位，距敌舰很近，中队长下令施放鱼雷，当即命中“中海”号一雷。与此同时，二中队向“台生”轮施放鱼雷，连放数枚，只见敌“台生”轮冒起两柱巨大的火光，爆炸声大作，“台生”轮沉没了。“中海”号带伤逃匿。我175艇施放烟幕掩护其他艇只返航，这时主机舱中弹起火，因大量进水而沉没。艇长以下7人失踪，其余人员被救护回来……

炮击金门期间，首战告捷，但第二战由于海上风浪大，超过鱼雷艇抗风性能，结果出击不利，一艘快艇沉没，导致不应有的损失。事情发生后，部队不少人议论纷纷，互相埋怨，还有的怪军区前指指挥不利。陶勇告诫他们：不准说三道四，注意友邻团结，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前指的一位同志过去是陶勇的老部下，此时更是感动，对海军的同志说：“请给陶司令带个好。我以前是他的老部下，那时就知道陶司令是好样的，他的纵队是好样的，现在他的舰队也是好样的。他的兵都是好样的！”

### （十）杨成武急了

1965年4月，陶勇专门到三十一大队蹲点一个多月，亲自抓“夜老虎”训练。他把“南昌”舰调到沙埕港，为第三十一大队担任目标舰。部队每次夜间出海训练，他都通宵坐镇“南昌”舰，发现问题，马上提醒。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三十一大队的夜战能力大为提高。

在蹲点期间，国民党“东江”号舰闯入我海区。陶勇得到报告，决心打击敌舰。他一边向上报告，一边亲率“南昌”舰接敌，并命令福建基地护卫艇第二十九大队出击。陶勇骁勇善战的战将本色不减当年，几次走出舰舱站在指挥台上，舰领导怕出危险，把他往舱里拉，他不干。最后舰长说：“司令你在这里太危险，这样吧，你先下去，一有情况我们再叫你！”

陶勇这才顺从：“好吧，一定要叫我啊！”

这时，福州军区的电报来了，要“南昌”舰立即返航。陶勇没作答复，指挥军舰继续前进；途中，李作鹏又发来了电报，催陶勇返航，陶勇付之一笑，按照自己的决心仍在奋力追击。

当“南昌”舰进入战区，快接近敌舰时，总部杨成武副总长获知此事，也是急得直跺脚：这么一个小仗，哪里需要舰队司令亲自出击，要是出了危险怎么交代！于是大喊：“南昌舰上还有个姓陶的！”亲自拟了一份电报，十万火急，命令“南昌”舰立即返航！

看了电报只得作罢的陶勇，直叫可惜：“电报晚来了会儿我就打下东江号啦！”

等了半年多，机会又来了。1965年11月13日下午4时，水警区收到上级的敌情通报：蒋军大型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13时由台湾启航，约于当晚21-23时抵乌丘屿执行特殊任务。

舰队、基地发出了准备出击的命令。16时40分，又传来了福州军

区和东海舰队的指示：“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先打掉一条再打另一条。”陶勇在电话里具体指示说：“情况要掌握好，准备工作要抓细一点，动员搞充分一点，打好这一仗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要向南海‘八六’海战的英雄们学习，要集中兵力，打近战、夜战，要打得坚决勇敢。”

陶勇特别强调“八六”海战，是因为这个歼灭战打得好，还出了个全国闻名的英雄麦贤得；全国都在学习他。而且“剑门”、“章江”那两艘敌舰本来是东海舰队金刚山观通站先发现的，东海也准备要把敌舰吃掉，可是敌舰偏偏向南海舰队作战海域跑，眼巴巴望着南海吃掉“肥肉”，“好战分子”陶勇心里能不着急嘛！

他的情绪无形中也感染着部队，部队听说要打仗了，顿时群情振奋，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出击的一切准备。21时10分，参战护卫艇第二十九大队、三十一大队和鱼雷艇大队分别到达娘宫集结。21时25分，编队按战斗序列准时启航。

月夜，乌丘屿海面东北风3到4级，轻浪，中涌，视距为1至2海里，正是炮艇和鱼雷艇海上打仗的好天气。

23点14分，指挥艇上的雷达兵刘启明，突然在荧光屏上发现两个针尖似的亮点一闪，他唰地把扫描线往上一压，亮度增强，两个目标一前一后，有节奏地跳动着。他的神经骤然绷紧，大声喊着：“发现敌舰！”并立即向指挥台报告了两艘敌舰的位置。

“咬住它，别丢了！”

魏垣武此刻已经抓住目标，右舷10度，距离10.5海里。而敌舰对我编队一无所知，两艘敌舰成近似右梯队，航速12节，间隔7至8链，正向敌占乌丘屿航行。

23时20分，魏垣武下令第一突击群展开右梯队，准备右舷攻击。

艇队瞬间高速启动。魏垣武所在的588指挥艇冲在最前，紧随其后的是579、576、577艇。海面上顿时划开白花花一道犁沟。

13分钟后，艇队第一突击群，突然出现在敌舰跟前，588指挥艇离敌舰只有500米时，魏垣武挥着拳头，一声喊：“打！”

顷刻间，4艘炮艇的全部火力，向前导敌舰齐射。几分钟内就把

2000多发炮弹倾泄到敌舰上。我编队从右舷60度进入，一直打到150米，敌舰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下子失去还击能力，慌忙向北偏东逃窜，连一枪一炮都未打出来。

然后形势的逆转也发生在这一刻。本来我编队第一回合就把敌舰分割，为鱼雷艇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我分工钳制的兵力没有及时展开，机械地执行“先打沉一艘”，以后制敌舰没有及时盯住，结果使后制敌舰腾出手来，对我编队进行反击。

“咣”地一声巨响，敌舰飞来的炮弹命中魏垣武的指挥艇和预备指挥艇，驾驶台上许多同志倒在血泊里。副大队长李铎和中队政委苏同锦当场牺牲了。魏垣武和其他6位同志也受了重伤。

艇长也倒下了。战艇失去指挥。魏垣武上半身全是鲜血，他艰难地看看艇上，对作训参谋刘松涛说：“你来操艇！”刘松涛也是重伤，不仅头部、臀部多处流血，连右臂骨头也被打断了。他点点头，努力地挪到了艇长的位置，抹了一把遮住视线的血水，操起艇来。一排巨浪打来，身子一歪，他觉得右手指也被打断，只连着一点皮。没法操艇，他就忍着钻心的痛，用牙齿咬下食指，用手腕把住艇……

魏垣武被弹片击中右眼，右胸锁骨被打断，骨尖刺破动脉血管，顿时血流如注。他昏迷在罗经盘上。激烈的炮火将他震醒。“敌舰呢？还没打沉啊？”他下令用信号弹和超短波机同时命令鱼雷艇实施攻击。信号兵王树生咬着牙发出了信号，把命令传给张逸民的鱼雷艇队。

正在鱼雷艇上的张逸民，突然接到攻击的命令，先是一愣，仗刚打起来，双方炮火如此激烈，怎么就命令鱼雷艇出击呢？但他马上意识到，肯定是炮艇编队遇到特殊情况。

雷达兵报告：“敌舰正向南逃窜！”

张逸民怕丢失战机，立即命令第二突击组出击。

海战仍在激烈进行，炮弹在两舷炸响，激起的水柱此起彼落。炮弹在海空间飞来飞去，照得夜幕下的大海一片火红。

鱼雷快艇131、152号向敌舰“永昌”号攻击。

张逸民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第二组攻击的同时，他就在琢磨，如果敌舰已经瘫痪，第二突击组完全有把握击沉它；假如敌舰还能机动，

并有火力阻击，那第二突击组就很难攻上去，必须组织更多的艇队强攻。

果然，第二突击组向敌舰逼近时，它的火力仍然很猛。看见鱼雷艇飞漂过来，拼命还击。受过训练的敌舰长对付鱼雷艇很有一套：他总是用舰首对准鱼雷艇，避开最大舷角，使鱼雷很难命中。当鱼雷艇企图向左右两舷夹击时，敌舰及时转向，使快艇徒劳。就像斗牛被角斗士哄骗一样。

3时52分，131艇占领敌舰左舷40至50度，距离只有300米，可惜风浪太大，看不清敌舰首，以为敌舰失去机动能力，发射两枚鱼雷，未中，只好返航。

14日零时02分，152艇第三次占领敌舰左舷70至80度，距离只有200米，判断敌舰航速8海里（实际上是12海里），发射两枚鱼雷又没命中。

戏弄了一番“斗牛”的敌“角斗士”，以为大势所趋，“永昌”开始班师回朝，“永泰”号已抢先一步，转眼已驶进乌丘屿。

张逸民焦急万分，眼看就要空手而归，还损兵折将，那怎么向舰队、向陶司令交代！他抓起话筒，请求海上指挥部，叫护卫艇编队快给敌舰一个打击。但是呼叫多次，没有回答，落后的通信工具几乎瘫痪了。

不能再等了！他和身边的大队政委贾毓文一商量：“不能眼看敌人逃掉，我们强攻吧！”

“好！强攻！”

“各艇注意，跟我上！”张逸民一声令下，4条快艇疯也似的朝敌舰猛扑，占领有利位置，正准备发射，敌舰又来了一个规避，改变了航向，也改变了瞬间的命运，摆脱了鱼雷艇的射击角。

张逸民想，不要点花招不行，于是命令一条艇佯攻，自己率两艇实攻。敌舰在规避另两艇时，张逸民的两条艇又找到有利位置。145艇艇长已冲到离敌舰只有400米的距离了，并处于最佳角度，谈艇长大喊一声：“预备——放！”

两条大鲨鱼似的鱼雷纵身一跳，跃入水中，向敌舰“永昌”号冲去。轰隆一声，敌舰尾部升起水柱火光，明显地往后坐了一下，慢了下一

来，不动了。145艇指战员高呼：“打中了！打中了！”

张逸民发现敌舰没有沉，不时还有发炮。他马上命令第三突击组两艇再次攻击。刚要冲上去，我编队588、589两艘护卫艇也发起再次攻击，集中火力攻敌舰水线下，敌舰加速下沉。

张逸民怕被我艇误伤，见敌舰舰首翘起，尾部沉没，急速下沉，马上命令鱼雷艇队撤出战斗。

1时零6分，“永昌”号一个鲤鱼翻身，腾起一团波涛就从海面上消失了。

敌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附近渔村，民兵们拿起武器，老乡有的拿菜刀，有的抓把斧头，朝集合地点飞跑，他们要扬帆出海去捉俘虏。

参战艇队返回基地时，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已处于休克状态。体温急剧下降，血压量不出来，伤势很重，生命垂危。周恩来指示：要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抢救魏垣武！陶勇亲自给基地打电话，待他病情稍微稳定，转到最好的医院。住院期间，魏垣武因失血过多，脉搏曾停止跳动几分钟，人们都以为不行了，可他又缓了过来。11月下旬，陶勇和福州军区皮定钧副司令员一起专程到医院看他，陶勇握住他的手一再说：“好好养伤，注意身体。”

魏垣武摇了摇头，因未能全歼敌人而一脸苦恼。

陶勇安慰他：“你们打得很好，全军都要向你们学习呢！”

1966年春天，魏垣武的伤势基本痊愈，转到上海411医院继续休养。一天晚上，陶勇专门派车把他接到自己家，设家宴招待他。席间，陶勇对魏垣武说：“一年前在莆田吃晚饭时，我曾要你打个大胜仗，你果然打了个大胜仗，今晚上，我在这里给你摆庆功酒了！”

## 拒绝阴谋：谁是下一个高岗？

### （一）从个人主义到“东北王”

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志丹等一起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王明“左”倾路线肆虐陕北，高与刘志丹等被捕入狱，即将被杀时，因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而获救。

1936年4月，深受陕北人民爱戴的刘志丹牺牲，难过万分的毛泽东对幸存的高岗就格外器重。高岗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主席等要职，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高在东北党、政、军内均任要职，解放后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一年他才44岁。高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对革命也不是一无贡献。但是，此人思想一贯不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其严重，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并且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对他的信任，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在党内刮起了一股搅乱人心的罪恶阴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最终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惩处。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是陕北人民无比热爱的革命领袖，而作为刘的同事的高岗，则无视红军森严的军纪，利用职权乱搞女人，劣迹昭著，差点被刘志丹枪毙。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妇联主任有些姿色，他又利用职权与其勾搭成奸，被人揭发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打击报复。解放战争时期，高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后勤供应工作，前方将士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殊死搏斗时，他却在后方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每逢周末都要举行舞会，甚至动用公款滥嫖白俄妓女。此外，他还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

毛泽东虽然让高岗任了要职，但绝不是无原则地信任他，一旦发现了高的问题，就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国路过沈阳，在高岗陪同下来到餐厅。毛泽东看到丰盛的饭菜顿时不悦，草草就餐后批评道：“我们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人们一层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第二天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这次和恩来同志等路过东北，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

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高岗当面唯唯诺诺，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听进去。毛泽东走后，他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地在东北大搞对他的个人迷信，公然以“东北王”自居。同时，他在东北背离中央正确路线，推行“左”的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把整个东北弄得乌烟瘴气。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入京，任国家计委主任。这是中央对他的重用，但他一肚子不快，认为大材小用。后来中央让他挂了个“东北局书记”之名，他才稍稍安心。到了北京，高将其多年养成的恶习从东北带到了北京，并在新环境里做了新的更丑恶更危险的表演。

## （二）转移的目光

刘少奇是我党德高望重的革命元勋，高岗却万分仇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对他展开过严肃的斗争。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高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既不与刘商量，更未向毛泽东请示，便擅自献媚地向苏共中央建议，把中国东北划给苏联，成为苏联的第17个共和国（苏已有16个共和国）。他还建议，在中国的青岛配置苏联海军，加强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刘少奇立即批评高岗，高不仅不听，反而反唇相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要求把高立即召回国。此后，刘少奇对高岗在东北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上的一些“左”倾错误也给予了严肃的批评。高对刘从此怀恨在心。

高岗进京后不久，中央酝酿召开一届人大和党的八大，要进行新的



人事安排。高岗发现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如何建国的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便像看中了行情的奸商那样，决心不惜一切，大干一场，大捞一把。高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耍了四大伎俩：

一是造谣生事。他知道，斯大林、毛泽东是当时国际、国内两位最有威望的革命伟人，只有借助他们的威望才能抬高自己、慑服众人。为此，他到处对不明真相的人宣传斯大林对他如何如何，并造谣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拍过他的肩膀……为了让毛泽东支持他，他还采取迂回战术，竭力争取斯大林的支持，并借斯大林的权威，间接影响毛泽东，使毛泽东最终也支持他。为此，1953年5月，他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说，他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可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请他“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中央有人反对我”。意即刘少奇反对他高岗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利用斯大林与美国的矛盾，在苏联客人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毛泽东明明是充分信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但高岗到处造谣说，“毛泽东已不重视刘少奇了”，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让他高岗搞政治局。他还造谣说，毛泽东还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总理，主张由林彪来担任，等等。

二是利用矛盾。当高岗察觉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有些意见与毛泽东不一致时，立即以捍卫毛泽东的面目出现，利用这种正常的不一致，搞不正常的政治讨伐。他把刘在工作中的一些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四处扩散，变本加厉地诬蔑刘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还公开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攻击刘犯了路线错误，给人感觉好像中央有什么来头。高的反刘，在中央财经会议上达到了高潮。1953年初，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政务院颁布的“新税制”。高岗得意至极，决心利用此机，“挖刘少奇的老底”。在中央为此召开的人数众多的财经会议上，高无限上纲，把一系列恶毒的政治帽子扣到了对制定“新税制”负有责任的薄一波头上。高恨薄也有来由，薄曾在1952年直接转交过一封“东北一学员”的信给毛泽东，信中揭露了高及东北个别干部的腐化堕落与贪污浪费问题。在批判“新税制”中，高故意把刘少

奇的一些话安在薄的头上狠批，不了解高的这一“批薄射刘”诡计的人，还以为高搞错了。由于高的煽动，会议越开越紧张，越开越不正常，有人甚至把这一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三是炮制蛊惑人心的谬论。为了孤立和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抬高自己，高利用刘、周均曾在白区搞过地下斗争的革命经历，炮制了荒谬的“两党论”、“军党论”、“陕北救中央论”。所谓“两党论”，就是别有用心地把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地分裂为两个党，即所谓“红区的党”与“白区的党”，“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所谓“军党论”，就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并危言耸听地说“白区现在要篡夺党”，鼓吹要重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结论。所谓“陕北救中央论”，就是说，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挽救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而他本人就是功高盖世的陕北根据地与红军的代表。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陕北救中央，而是中央救陕北。没有陕北，中央会更困难一些，但若无中央到陕北，陕北根据地会很快全部丧失。高岗出于不可告人的个人野心，胡诌出这些荒谬的理论。

四是用封官许愿、挑拨离间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在党内拼凑以他为首的帮派势力和人事网络。为了倒刘倒周，高不择手段地四处拉人，一会儿许愿提张三为候补中委，一会儿又许愿提李四为政治局委员，一会儿又许愿提王五为部长。与此同时，又造谣某中央领导不赞成某某任部长或到某省任要职。他不仅拉拢一般领导干部，而且还积极拉拢林彪、饶漱石等中央局负责人。

在串联上林彪之后，得意万分的高岗又去做串联饶漱石的工作。饶当时虽身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此人与高岗一样，灵魂深处也很肮脏。早在苏北抗战时期，陈毅就揭发饶有“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并当众严厉警告他：“常言道，小聪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对于陈毅的警告，饶根本不听。中国革命胜利后，饶与高一样野心更加膨胀了。1952年初，由于他身体不好，中央调他入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休养，这是中央对他的关心，但他却以为中央对他不满，发展到在毛泽东面前装疯，一定要毛